

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1103020202)

中国·传播·世界

译星 主编

译学与跨文化传播

麻争旗◎著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传播·世界

李锐 主编

译学与跨文化传播

——对翻译的根本反思

麻争旗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翻译的文化功能,从翻译活动过程解析翻译的心理学机制,从翻译方法上研究翻译的传播价值,由此构成知识论、二度编码论和价值论主要三论,回答了译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书中关于翻译二度编码的观点、结论中关于媒介跨文化传播的思想以及翻译学的建构主义的思考是本书的创新发现,具有学术前沿的意义。各章中关于译制的案例分析是作者多年翻译实践的理论升华,在译制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本书的理论性较强,读者为具有一定的外语、翻译、新闻、传播学学术背景的人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学与跨文化传播:对翻译的根本反思/麻争旗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传播·世界)

ISBN 978-7-313-07294-8

I. 译... II. 麻... III. 翻译学—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8947 号

译学与跨文化传播

——对翻译的根本反思

麻争旗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9 字数:297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7294-8/H 定价:4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4742979

序 言

传播是什么？中外学者曾经给出过许多定义。而这一套题为“中国·传播·世界”的丛书，显然是试图在这三个关键词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其中最主要的关键词当然是“传播”，这不仅仅是试图突出学术探讨的专业性，更重要的是“传播”这个词在今天的的确确成为我们社会存在的要素，被传播的信息构成了存在的语境，无论是村庄院落的日常生活，或者是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和阐释已经无法回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 世纪中期初露锋芒的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的结合，在今天已经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这种硬件技术的创新，修改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概念。从 70 年代开始，由于信息技术的革命，与时间同步的远程数据传输成为可能，资本流动的加速为随后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信息配置。随后在 80 年代，世界逐步进入信息产业时代也就是后工业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指标中，不再以硬件形式的工业产品数量（如钢铁产量）作为评估发展水平的标准，而是在第三产业化发展导向中，越来越注重象征形式的产品，软件形式的信息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引导性在加大。这种借助于信息传播技术所产生的国际传播逻辑的演变，可以称之为信息逻辑。如果说 19 世纪的关键词是生产。那么从信息逻辑出发，人们总结出 20 世纪的关键词是交换。这不仅仅是世界运行机制的一种哲学隐喻，更重要的是通过信息传播在受众心目中产生的观念和想法的置换，是新的文化心理的培育和社会心理的发酵，使得信息交换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动力。在经济生产领域，这种交换推进技术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政治文化领域，这种交换使得信息发布的数量无限增长并引发质量竞争，信息透明度的技术可行性在增长，成为个人、集体和社会发展的导向性要素。

在今天，一个具体的社会时空可以通过信息触及到民族国家的制度边界或者是成为全球传播的参与者。因为“蝴蝶效应”告诉我们，世界范围内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强化，是可以通过信息链接成为可能。如果信息是一种资本，

象征资本或文化资本,在其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对信息交换的形式条件的创造成为一个技术演进的结果,即通过时间来打破空间,这就产生时空的压缩效应,强化某种意识的可沟通性和相互依赖性。正是因为全球化在加速普及人类生活经验的同一性,类似的信息效应的可移植性可以激发类似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的传播过程如果得以成立,肯定就是一种价值化行为和诱惑方式。在这种大范围、高速度的信息流通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信息的多元成为一种常态,那么信息的集中和离散并存亦是一种必然。

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是中国如何参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竞争,包括生产力竞争和象征符号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社会和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受制于技术程序,如技术系统的同质化和标准化在增长,所有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成为一个技术程序。技术的目标是要统一,要规范,通过品牌形成市场半径。另一方面,文化系统的分化也在增长,出现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趣味差异。文化空间有固有的边界,独特的“核心情感”以及身份认同需求。试图统一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在地化将会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乌托邦。因为在当今的信息条件下,对一个与全球化产生信息关系的普通人来说,他所感受到的外来价值和本土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身份认同的多重困惑。要检验传播效果,焦点在于受众在什么情况下是主动的。客观说来,如何认识和打破这种困惑,成为我们思考的原点,比如说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内部的信息挤压究竟是否具有社会意义?我们的国际观念如何产生一种真正的对象意识?我们如何把握国际传播的历史逻辑的演化过程?我们能否从语言交流的置换过程中找到我们的文化自信等等。希望这套丛书作者所提供的思考能够激发和深化上述问题的探讨。

这套丛书的来源是近五年来在中国传媒大学通过答辩的传播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特此感谢中国传媒大学“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对这套丛书提供的资助。

2011 年 8 月 9 日

目 录

导论 翻译为何 何为翻译	1
第一章 译事与知识流通——从功能看本质	17
第一节 译事知识论:翻译传递语言信息	17
第二节 译事文化论:翻译推动文明进化	24
第三节 译事传播论:翻译沟通全球资讯	31
第四节 余论: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	37
第二章 译传与符号互动——“元”翻译学	44
第一节 二度编码论	46
第二节 双语思维论	51
第三节 译术策略论	64
第三章 译品与价值交换——精神创造的魅力	76
第一节 传通之术	77
第二节 移植之法	92
第三节 再造之艺	104
第四章 案例分析:译制的文化功能	115
第一节 译制文化与译制主体	116
第二节 思想移植与观念更新	119
第三节 系统管理与安全审查	125
第四节 民族交流与社会进步	129
第五节 文化输出与国际影响	131



第五章 案例分析:译制的语言策略	135
第一节 社会历史语境	136
第二节 跨文化交流语境	141
第三节 跨语言情景语境	146
第六章 案例分析:译制的“屏幕魅力”	160
第一节 生活化	161
第二节 风格化	165
第三节 戏剧化	170
第四节 贴切化	178
第五节 策略化	180
第七章 案例分析:译制建构学	185
第一节 话语文本建构	186
第二节 文化语境建构	207
第三节 艺术品味建构	219
第八章 结论:译学与跨文化传播	235
第一节 译学与哲学	235
第二节 翻译语言观	240
第三节 翻译传播观	245
第四节 媒介翻译学	253
第五节 媒介翻译原则	264
附 国内影视翻译研究综述	278
主要参考文献	287
后记	294

导论 翻译为何 何为翻译

一、本书框架和基本命题

本书的主体框架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视点,运用传播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涉及译学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历史的描述和现实的思考。本书从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两条主线展开,其中“译事”、“译传”和“译品”三章,是对译学的理性概括,与之对应的关于译制的三章,是对理论认识的验证、补充和延伸,两条路线共同指向本书的最终目标——媒介跨文化传播学。

二、选题背景和基本思想

翻译是古老而永远弥新的工作。翻译的主要功能是沟通语言、实现文化互动,推动文明进化。人们关于翻译的思考与翻译的历史一样久远。译学是关于翻译的学问,是关于翻译的起源、性质、特征、功能、方法等基本问题的学说。诸如“信达雅”、“传神论”、“化境说”等等,只是历代翻译大师们的经验的结晶、智慧的精华,也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指导意义,但是未能构成关于翻译的系统学说,因为这些译论多是“描述”翻译的“表征”,说明翻译的规范,讲的是“翻译应该怎样”的要求,而没有去进行纯理性的思考——回答翻译到底是什么。这是由于缺少哲学的关照,缺少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人与语言的关系的层面去分析翻译的本质,因而始终未能全面系统地回答关于翻译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最终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更不能回答翻译跟文化传播之间、翻译跟人类文明进化之间、翻译跟人类语言存在之间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横向来看,译学跟文化学、传播学、语言学这样的成熟学科之间未能建立起相应的联系。从学术倾向来看,翻译研究不仅长于搞实用主义,而且往往喜欢走捷径,喜欢拿来主义,喜欢套用成熟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解释、分析翻译的问

题——而且主要是分析翻译过程中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在近几年的学术期刊里出现了一大批涉及各种文体的翻译案例分析文章,其中用得最多的分析方法是西方的语言学,比如关联理论、功能理论、语境分析法、话语分析法等。笔者注意到,如果把这些文章中的案例剥离出来,然后用简单的“信达雅”来分析,那么,其效果几乎没什么两样。于是,我们可以大致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内关于翻译的研究还处在低级模仿阶段,大家好像是在学习“方法”,而不是在思考“翻译”。

那么,翻译在文化学、传播学、语言学的研究里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呢?答案是:有名无实。翻译的重要性是得到公认的。但是,翻译到底怎么重要就无从谈起了。打开文化学的著作,很难找到分析翻译的章节。在语言学的论著里很少有关于翻译的专项。传播学应该关注翻译,因为没有翻译就不会有跨语言、跨文化传播,然而,不要说在普通传播学里,就连在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传播学等这些跟翻译密不可分的学科里,翻译也只是点缀。在笔者担任主译的长达70万字的论文集《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①里,找不到关于“翻译”的只言片语。笔者曾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说了这么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交流”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语言的差异,难道大家都懂、都能使用彼此的语言吗?按照常理,掌握一种语言者多少会了解一些这种语言的文化,而完全不会这种语言的人同时应该是这种语言文化的陌生人。既然语言不通,又“没有”翻译,那还谈什么交流?显然,作者是有意回避了翻译问题,这就等于绕开了语言差异。这种做法跟麦克卢汉论述媒介理论的思想逻辑如出一辙。不过麦氏比萨氏更坦率,因为他干脆否认翻译存在的意义:一方面他幻想着“机器取代论”,同时又企盼“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似乎不是翻译,而是绕开语言去支持一种普遍的寰宇意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的“无言语状况”^②。由此看出,语言信息的互动问题未能进入国际传播学或者跨文化传播学的视域。不过,在引进跨文化传播学(或者叫跨文化交流学,在本书中这两个概念同义)的过程中,语言和翻译的问题已经得到了重视。在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里专设关于语言和翻译的章节。但是,这里的翻译跟许多其他翻译研究一样,讨论的议题

① 萨默瓦·波特. 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M]. 麻争旗,等译.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②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7,84.

是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而不是文化中的翻译问题。

由此不难看出,译学和跨文化传播学之间虽然有某些串联,但总体上是分离的。其实,这两个学科本来就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而且两者之间看起来也的确没有本质的联系,因为译学往往属于语言学或者文学的范畴,而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化与交流的关系,特别是文化对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关世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翻译的活动无时不在与文化传播发生着难解难分的联系,无时不在对传播学,尤其是跨文化传播学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正是学术领域的分离局面与现实领域的沟通状况之间的这对基本矛盾是本研究选题的导因之一。

翻译在西方也是古老而现代的事业。翻译对于沟通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西方的翻译思想史同样经历着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不过,近现代的西方译论随着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其特点是,不仅朝着建设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系统完整的翻译学科的方向突飞猛进,而且采取跨学科、多角度的方法把翻译研究跟哲学、语言学、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硕果累累、气象万千。

与西方的学术进程相比,我国的译论则似乎刚刚突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自我循环框架,似乎还没有摆脱传统译学思想的束缚,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翻译无学”这样的落后思想的干扰。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一个引进西学、反思传统、努力建构现代意义的翻译学科的宏大工程业已开启。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翻译的学术思考和成果日新月异,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

但是,总的来说,关于翻译的基本问题,其中包括翻译的起源、本质、任务,翻译的社会文化身份,翻译学对于哲学、语言学、文化学的意义等重大问题,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学术力量的分配很不平衡,比如,文学翻译研究较为厚实、丰富,科技翻译大踏步向前,但是,关于翻译的根本属性、关于翻译的思维发生机制,以及从语言文化视角的思考等等理论研究依然薄弱,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口译、同声传译、导游翻译,特别是大众媒介文本的翻译问题,比如新闻翻译、广告翻译、影视剧的翻译等等,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些恰恰是当代社会跨文化信息交流中最最活跃的场域。为此,笔者常常辗转反侧,这样一个充满学术诱惑力的大舞台何以遭此冷

落！至于令人羡慕或不解的同声传译，则更很少引发什么学术问题，想必在不少人眼里那只是雕虫小技，或一点天赋所使然，怎能唤起哲学家、传播学家们的好奇心！可是，如果进入同声传译者的思维场里，却能发现那些看似简单实则神秘的心理机制、语言机制、生理机制。如果深入探视电影配音翻译者的情感世界，那又会体会到怎样一种扣人心弦的节奏和律动！

笔者正是带着这份疑惑开始对翻译问题，尤其是各种不同的翻译形态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学术思考，其中收获最大的是关于国际新闻编译和影视剧译制的认识。

这两个概念既对立又统一。所谓对立指的是其信息类别的不同：一个属于新闻，另一个则属于文学。所谓统一指的是其行为的一致性，那就是“译”。但是，在人们的认识当中，往往只见对立，不见统一，这从大学的课程设置就能看得出来：新闻编译是国际新闻的专业课，而影视翻译是影视译制的专业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撇开新闻和文学的差异性，编译和译制这“两种”活动就成了“一种”活动，其本质是语言交换，其目的是为了解决语言差异而实现信息互动，其行为是通过媒介进行跨文化传播。

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因为这几乎是个常识。真正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这样两种跟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在研究领域——不论是在有关翻译的教学和学科建设中，还是在有关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中——未能得到应有的关照，基本处于被搁置、分离的状态^①。而在香港和西方学界这两种活动早就被纳入“媒体翻译”的范畴，成为了学术讨论的重要话题。由此不难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内理论研究对于社会实践

^① 根据全国知网“新闻翻译、编译”主题词查询，在1990~2000年间共有45项（合并为40篇），除去非相关的只剩不到20篇。说明这个时期新闻翻译问题没有成为学术的话题；在2000~2010年间，共有360项，其中100项是硕士论文，如果再除去非相关项，剩下不到200篇，其中不少是“体会”和“小议”，算不上学术论文，说明这个时期新闻翻译的话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从著作情况看，关于新闻翻译的专著几乎为零（有的著作里包含新闻翻译的内容），只有三本教材，其中两本都是刘其中著，即《新闻翻译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标明“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和《汉英新闻编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标明“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另一本是张健著：《新闻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标明“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由此看来，新闻翻译的问题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学术话题，但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还很匮乏。

是滞后的。

鉴于此,本书的立足点便是:

第一,突破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局限性,通过锁定“信息互动”的断面,抓住“语言转换”的核心,从“译事”、“译传”、“译品”三个纬度分析翻译的起源及其对于人类社会交流互动的本质联系(功能论),揭示翻译的本质及传播原理(本体论),透析翻译的传播价值(价值论),并且把翻译的基本属性、存在方式、传播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关于翻译的基本认识框架(译学)。

第二,按照上述认识框架,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典型形态“影视剧译制”进行案例分析,形成关于译制的功能、本体和价值的基本认识框架(译制学);并以此为基础,把译学跟跨文化传播学结合起来,初步形成关于媒介跨文化传播学的基本理念和研究方法。

那么,贯穿这两个立足点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正是翻译的思想,也就是译学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是由翻译的根本属性所决定的。翻译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即“传通”。是心与心传通、是明言与潜台词的传通,不仅是意思的传达还是意识的传通,也就是说固然是“传”,更重要的“通”,翻译工作的表象是语言转换,翻译性质却是意识的客体化。早在《礼记·王制》里就有记录:“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由此看出,“达其志、通其欲”才是翻译的根本。也就是说,翻译首先是存在论的。

翻译即传通的思想澄清以后,关于翻译的认识,诸如翻译的功能、翻译的原理、翻译的价值便可有机地联结起来,形成系统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同时,有关译学研究,比如翻译语言学、翻译文化学、翻译传播学、翻译文学等不同的知识系统便可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共同建构起译学的知识系统;而且,译学研究的成果会促进语言学、文化学、传播学、文学、哲学等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使之在新的层面上以新的功能样态联系起来,这个新的层面就是知觉(能动的感性)语用学。除了技术说明书类型的翻译不需要感觉的在场,凡是包含着意识活动的活的语言的翻译都有个“语用”问题(语法、语义基础上的用法问题)。语言不是单纯的表示对象。语言包含着经验。翻译出语言包含的经验就是建构意义。最高的翻译是能够保持“经验的现场化”。这个新的层面当然是活性论的语用论。在此新的层面上整合新的问题才有意义。翻译使不同的语言之间既相互

联通又彼此对立,如果没有翻译,整个人类社会的语言存在的方式将会采取另外的逻辑;翻译使不同的民族可以通过语言进行知识交换、文化信息互动,如果没有翻译,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将会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翻译通过信息转换把世界各国联结成为一个全球传播系统,翻译使五湖四海的人民“达志通欲”,使不同的民族可以平等对话,那么,如果没有翻译,全球信息互动将采取怎样的方式?麦克卢汉所向往的那个以“Mc-language”或“Mc-culture”为霸主的同质化的“地球村”将可能成为全球一体化的作品。在如此这般的喧闹声中,广大的翻译者们却以文化使者的姿态、哲学家的胸怀、艺术家的天才为描绘一个充满民族风情的五彩缤纷的全球村落的图画而矢志不渝地忙碌着。

翻译即传通的思想表达的正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反映的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根据这个思想,发生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形态中的翻译活动的共同本质便呈现出来。不管属于哪种媒介,也不管是何种信息,只要因为有语言差异而需要进行语言转换,那就是通过翻译而进行的信息传通和文化沟通。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共性,具有新闻传播属性的国际新闻编译跟具有文学艺术特征的影视剧译制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归宿——媒介跨文化传播。

获得这样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因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是模糊的,而在专业教学中针对这个两个专业的学科定位也是模糊的。

比如,就国际新闻来说,本来从字面上看,国际新闻的特征一目了然:国际间的新闻。可是大家经常睁着眼说瞎话:中国媒体向国外进行新闻报道——这是典型的跨国界的新闻,也就是国际新闻,可实际上,平常人们说的国际新闻恰恰不包括这一部分,而是指“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也就是国内媒体对国外事件的报道,而“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则被统统称之为“对外宣传”。不光是概念不清,理解上也是片面的。从本属关系讲,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既然是“新闻报道”,中心词是“新闻”,其本质特征也应该是新闻。可是在关于外宣的话语里,新闻性的地位远不如外交政策、国家形象、宣传艺术等突出。本来是新闻活动,本来应该首先讨论怎样做好新闻、怎样满足受众需求,可是在许多人的思维里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就把政治放在了第一位,因为在人们的耳边会经常敲响“外事无小事”的警钟——这大概是认识上的根源。

实际上,认识对外新闻报道的特征并不难。只要想一下应该用什么语言、采取什么表述方式、讲什么内容这样几个简单问题,就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因为答案也是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长篇累牍的论证:用当地人能够明白的语言、能够接受的表述方式、讲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这三个要素可以说是对外报道实现有效传播的基本条件。所谓基本条件就是缺一不可。然而,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却没那么简单。比如,就拿语言来说,我们说的话人家能明白吗?答案是未知的。这是因为,语言的意义不能脱离语境而存在,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语境里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新闻话语也是如此。由于对外报道的受众与报道主体之间发生语境错位,所以,同一个概念会被理解成不同的意思。这样,在语言概念上引起误解就是常态。这就是说,我们在主观上感觉说得很清楚了,到了外国受众那里却可能并不清楚。再比如,我们的报道方式人家能接受吗?答案也是未知的。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文化里,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模式是不一样的。对待同样的新闻事件,人们可能采取不同的观察视角。这样,在表达方式上出现认知偏差也是常态。这等于说,我们在主观上感觉报道某个事件的表述是合适的、解释也是合情合理的,可在外国受众看来却不一定恰当、不一定合乎情理。按照同样的逻辑可以推知,在内容选择上出现关注点错位也并不罕见。我们在主观上感觉值得关注的事在他者看来可能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我们感觉没有意义的事,人家反而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如此等等。事实上,在对外传播中,自说自话的现象相当普遍。因为人们很难摆脱自身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束缚,往往会在对外的问题上套用对内的做法。尽管对外传播也强调“三贴近”,可是到底贴什么、往哪儿贴、怎么贴却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对外报道在国外受众看来,语言不太明白,或者方式不好接受,或者内容不够生动——不管哪一种情况发生,更不用说其中两种甚至三种情况同时出现,那么,从主观上任何被寄予它的目的、使命、愿望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们马上可以看得出来,影响对外传播的主要因素显然不是政治觉悟,也不是宣传艺术,而是语言和文化,也就是跨文化性,因为这一条是决定性的。离开了跨文化关照,一切都是空谈。要说有什么宣传艺术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传播艺术。就翻译的艺术性而言,本文试图提出,翻译如同演奏,被译的如同经典名典,谁来翻译就如同谁来演奏,演奏要求的全

部的理解和技巧在翻译中同样存在。没有技巧就不能出感觉,没有感性的感染就没有艺术效果。

跟国际新闻的情况一样,人们对译制的认识也是模糊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片面,二是肤浅。

所谓片面是指:只讲配音,忽略字幕。译制的任务是对影视剧中的语言进行转换,其主要工作是翻译。至于翻译好的文字采取什么方式跟受众见面,那要依技术、环境等客观条件来定。所以,配音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字幕也是很重要的方式。可是,大家平常讲的译制片绝对不包括网络在线上的外国影视节目(字幕片)。这当然跟我国的历史发展有关。新中国诞生后,为了让广大老百姓看懂外国电影,国家大力扶持配音译制,“译制片”成了外国电影的代名词,不少配音作品成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不少译制台词成了社会流行语,优秀的配音演员成了人们的偶像。可见,译制跟配音联系起来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进入网络时代,当谈到选择配音版还是字幕版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成喜欢看译制片或者原版片。

然而,对于译制研究来讲,就必须有个清晰的概念。从本体上看,只要有语言转换,那就属于译制研究的范畴。这样一来,不仅加字幕的外国电影电视剧要被包括进来,连明明是国产电影电视剧,因为加了英文字幕,或者进行了语言转换,所以也要被包括进来。不仅如此,译制的概念还会打破译制片属于国际传播的说法,因为我国的译制工作不能不包括汉语(也有外语)与少数民族语之间的转换,也就是民族语译制。可见,我国的社会实践为译制概念的扩大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案例。

所谓肤浅是指:只见配音,不见翻译,把译制变成了语言表演学;或者只谈文学,不见语言,忽略语言和翻译的存在。这种状况也是由社会历史原因所致。译制的概念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特征也会不断变化。在媒介贫乏的时代,看译制片是难得的艺术享受,人们自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美妙的声音”上,至于其中的语言转换——文化互动,那不是百姓们思考的课题。大家可以模仿配音、学唱歌曲、传诵台词,甚至模仿片中人物的言行乃至生活方式,但不会静下心来分析翻译做了什么、为什么。结果,“用声音塑造形象”就成了译制艺术的基本话语。的确,以往国内关于译制的学术思考主要集中在配音艺术上。这也难免,因为大家感受到的是声音,而翻译是隐蔽的。然而,当人们开始

反思译制的质量的时候,才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决定译制质量的关键不是配音,而是译本。译制的本质不是声音的替换,而是语言的转换,声音只是语言转换中的一种方式、一个环节。当然,凡属本质的东西往往是隐性的,需要借助某种外在的形式来显示。译制的本质就是通过配音(或者字幕)表现出来的。正是因为翻译需要通过配音才能发挥自己的功能,又由于配音活动本身具有艺术性,可以增加艺术感染力,所以,在一段时期,语言表演的表象遮蔽语言转换的本质也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当事物进一步发展,当人们接触的不只是一种而是多种表象时,本质的不同侧面才会逐渐呈现出来。人们对译制的认识也是如此。当字幕也成为一种表达方式凸现出来,甚至对配音的存在构成一定威胁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发现,原来译制的主要工作是语言转换,而不是声音表演。配音的确具有艺术性,但译制的根本目的却不是增加或者减少艺术性,因为创造屏幕魅力是手段,实现跨文化沟通才是目的。

其实,由于影视剧本身是艺术,译制是对艺术作品进行再加工,所以整个过程必然具有艺术性,其中,除了配音外,翻译、导演、录音等各个环节都服从艺术再创作的原则,因而,译制的艺术可以统称为“语言转换艺术”,或者更具体一点,叫做“媒介跨文化语言转换艺术”。

由此可见,媒介跨文化传播的思想为译制的学科发展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话语和路径。从此,译制研究者再也不用寄人篱下——一会儿投靠戏剧影视文学、一会儿投奔国际传播学、一会儿被赶到配音学、一会又被挤到外国语言文学——大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译制是跨文化传播,译制是通过媒介进行的语言转换艺术。

三、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翻译是实现大同理想的阶梯。

从社会意义看,媒介传播反映了人类社会不断进行交流互动的本质。传播的全球化是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说到底国际间通过媒介进行信息交换、进行文化互动的需要,从文化意义上说是人类相互学习、共享知识、共同进步的必然所在,这也正是译事活动的根本历史使命。译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说到底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传播,实现知识共建、信息共享、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也就是求同存异、建设和谐社会、为大同感世的到来而努力。译学与跨文化传播的结

合点就在于从信息符号转换,或者说语言文化互动的层面探讨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规律,回答全球传播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中不仅包括全球知识流通、知识管理、信息安全、文化建设这样的基本问题,而且也涉及诸如中外媒体之间如何进行新闻信息交换、如何进行像译制片之类的非新闻信息的传输等涉及国家信息安全、文化传播战略、文化产品贸易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课题。

从研究现状来看,一般的媒介理论研究虽然也涉及语言问题和文化问题,但往往限于语言的符号层面或者媒介体系、媒介霸权之类,很少从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视角深入到媒介传播的各个具体环节去展开分析;以往的跨文化交流学一般研究人际交流的问题,虽然已有向组织传播、国际传播伸展的学术趋势,但还未能跟媒介信息交换研究结合起来,因而也不能回答媒介传播如何解决文化差异、实现有效、安全的信息共享的基本问题;套用已有的传播学理论不能说明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问题,因为符号传播的普遍公式是以“你知我知”的同一符号系统为前提,而跨文化传播的根本问题就是要解决不同的语言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

目标如此崇高,而现状却令人沮丧,目前的翻译研究往往局限于翻译问题本身,最常见的现象是介绍方法、技巧和经验的多,强调技能训练的多,而探讨翻译的思想、观念,翻译的属性、功能、价值以及翻译的心理学、文化学、哲学这样深层次的研究少,把翻译作为一个学科认真地去建构基本理论的研究更少,至于把翻译学看作很深的学问予以安身立命、给予足够学术尊重者则更是鲜而有之。所以第一步,应该重视问题化:

比如,我们见得最多的是用语言学甚至语言哲学来研究翻译,但我们何妨用翻译学来思考语言学或者哲学,从而撞击反射互相发明?其中就语言学来说,语言学家指出,人使用语言进行思维、形成价值观和世界观。可是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语言,因而也就有那么多的世界观,而大家又说我们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还说求同存异、和谐社会,那么,是谁又是怎样使这些不一样的“世界”既同,也就是可通、相通,又异,也就是对立、分离的呢?由此,翻译使语言学成为了问题。

人们习惯认为,表达思想只有一种语言,就是单数的以科学逻辑为蓝本的概念语言(“神圣语言”或“逻辑语言”),而翻译面对的却是复数的语言(即“语词世界”),翻译的过程是把原本的“文化因子”移植到译本中,使之在译语之中“来